

国庆节忙着参加婚礼「份子钱」成沉重负担

五千元出头的月工资都不够「随份子」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良辰已定，吉日待访，吾有薄酒，以谢良友。敬备喜宴，随候尊驾！我和××的婚礼定于今年10月6日中午在××酒店举办，诚邀您见证我们的幸福时刻。”

9月下旬，收到初中同学发来的喜讯，安徽省宿州市的张杰（化名）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这意味着，近期他又要掏一笔“份子钱”。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国庆节期间要参加5场婚礼，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似乎不够。

“我之前已答应同事10月6号参加他的婚礼，初中同学的婚礼肯定无法抽身参加，但人不去，‘份子钱’也得出呀。”张杰颇为无奈地对《法治日报》记者说，最终，这个国庆节他“随份子”总计支出6100元。

“去年国庆节‘随份子’随了4000元，今年6100元，而我的月工资才5000元出头，都不够‘随份子’的。”毕业工作4年的张杰忍不住吐槽道，“为什么‘份子钱’越来越高了？”

今年中秋国庆节双节期间，和张杰有相似经历，为“份子钱”而烦恼的人不在少数。

近期，“妈妈坚持让女儿婚礼随2千”“大学生蹭酒席随礼100元被指太少”等话题引发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们那里给关系不是很近的人随礼都要上千了”“随礼100元都不好意思坐下来吃饭”“国庆8天假期7个朋友结婚，工资直接打到他们卡上吧”“十一一到，一月白干”“一月工资不够国庆参加婚礼的份子钱”……

从贵州来北京打工的李登（化名）告诉记者，几年前他和亲朋好友都默认“份子钱”为200元，但这几年水涨船高，“份子钱”涨得比工资快多了，300元成了基准线，而且大多时候已经拿不出手，一些人都五六百元的随，自己囊中羞涩，一到节假日压力巨大。

《2022职场人国庆长假调查》数据显示，职场人在国庆期间给出的“份子钱”，人均高达2369元。其中，给出1001元至3000元的职场人最多，占比33.6%。

亲朋遇喜事，“随份子”本应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祝福方式，如今为何变成了“甜蜜的负担”？不少人抱怨：这样的“份子钱”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但按照风俗习惯，不给“份子钱”又不切实际。“不随礼，等于把亲戚朋友得罪了，背后指不定怎么议论你，以后有事也不会出手帮你。”张杰直言。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德文看来，“随份子”具有合理性，从文化角度来讲，“随份子”有两层含义，一是表达情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需求；另外“随份子”一般是遇到婚嫁嫁娶等特定事件，完成这些大事需要支出不菲的费用，对一些家庭而言未必能独立承担，亲朋好友之间的“份子钱”具有帮助和互惠的功能。

“抱怨‘份子钱’压力大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正处于亲戚朋友婚嫁嫁娶比较集中的阶段，而自己往往刚开始立业，没有太多经济积累，因此觉得‘份子钱’成了负担。”吕德文说，此外，“份子钱”表达情谊的功能相比之前在减弱，而功利性的考量在增加，有些人还想着靠办酒席多挣点钱回来，“随份子”变味了，人们的情绪就不太好了。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也发现，有些地方的“份子钱”变味严重，金额越来越高，甚至形成一种互相攀比的趋势，“比如你随礼1000元，回礼的时候我要给1200元甚至更多，你再随礼的时候金额又得增加，双方抬来抬去，价格越来越高，也就成了负担”。

实际上，国内不同地区“份子钱”的数额也有差别。网上流传一张“全国婚礼红包地图”，浙江和上海以1000元的红包水准领跑全国，河南500元，广东非常低调接地气，结婚只需要随礼100元。网友笑称：请广东人民把“份子钱”打下来！

然而，把“份子钱”打下来，并非易事。2021年4月，民政部将广州市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之一。通过出台实施方案，强化宣传引导等有力举措，文明简约的新式婚礼成为新风尚。比如在广州市从化区的一个村，当地结婚“随份子”钱不超100元。

2022年河南省民政厅同意将开封市、焦作市孟州市、商丘市永城市等20个地区确认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在河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农场班村，除了倡导“零彩礼”外，村委会还倡导，除了亲属外，乡亲们随礼不要超过50元。

但有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很多人并没有按照倡导在做，有的人觉得50元、100元的拿不出手，有的人之前收的礼金较高，别人有喜事自己不可能降低“份子钱”，甚至还有人在想方设法摆宴席收“份子钱”。

9月26日，有网友在重庆网络问政平台发布求助帖，梁平区铁门乡“无事酒”盛行，大人娃儿过生日也要办酒，有村民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把女婿、外孙弄回铁门来办生日酒，还有村干部的父亲是明年周岁生日却改到今年办酒……

据公开报道，有些地方的“无事酒”纯属无中生有：抓头猪要办，麻将输了要办，考上高中要办，什么都可以当作由头。

吕德文说，因为“份子钱”有互惠的关系在，所以它是循环的，付出的“份子钱”，之后因婚嫁嫁娶又回来了。“份子钱”100元、200元还好，如果再低可能连酒席成本都回不来，如此，可能送礼的人不想送，收礼的人也不想收，但为了赚回此前投入的“沉没成本”，便不得不加入循环，成为其中的一环。

“‘份子钱’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不管哪一个时间节点，总有人办了酒席成本可能收不回来要吃亏，而‘随份子’是一种习俗，不应用法律强制规定随多少合适，只能通过倡议倡导，对于党员干部可以采取组织条例增加约束力，但对普通民众约束力很低。”吕德文说，建议通过倡导或用村规民约等形式，降低不必要的酒席频次，有效减轻“份子钱”负担。

孟强认为，虽然约束力较低，但还是应当坚持倡导，潜移默化地让人们形成“份子钱”太高不好的观念，遏制“份子钱”不合理上涨的趋势。此外，“份子钱”越涨越高也可能和红白喜事的铺张浪费有关，花的钱多了收的礼金自然就高了。因此，很多地方都倡导红白喜事简办，这对于“份子钱”改革也有很大作用。

“不管是送礼物，还是‘随份子’，大家最后都逃不过这份人情往来。如果平时走动比较多，联系比较紧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大家互相帮一下，这时候收获的亲友情谊，可能比‘份子钱’更能够体现人和人之间的美好情感。”孟强说。

“有案不立”顽瘴痼疾如何破解 南京公安建立三级实体受立案机制



调查动机 长期以来，报案难、立案难是群众对公安工作不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影响公安执法公信力的难点堵点。立案难成因复杂，既有部分报案人的诉求超出法律规定范围，期望通过公安机关立法侦查达到施压、取证、调解等目的，给公安工作增加了负担；也有一些案件披着“经济纠纷”外衣，或民刑交叉，有的基层派出所刑事办案能力不足，加上管辖不明、管辖交叉等，出现互相推诿、程序梗阻等问题。近一年来，江苏省南京市公安机关把执法权力规范运行作为警务机制改革重要内容，大力提升执法为民理念，在江苏率先建立三级实体受立案机制，有力破解有案不受、立案难等顽瘴痼疾。为全面了解这项警务改革的进展，记者深入南京公安机关一探究竟。

前沿观察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前不久，一名男子带着一袋子资料，惴惴不安地走进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公安分局案件受理中心，向值班民警提出控告称，他签约的一个工程项目在转账150万元保证金后，却迟迟无法进场施工，怀疑被诈骗。值班民警没有以涉嫌经济纠纷为由，把报案人推到法院解决，而是耐心听取其陈述并详细制作了笔录，按照“报案必接、有案必究”的原则，认真梳理每一笔账目往来，将案情直接录入到警综平台，经梳理研判，初步认定该案系一起“一鱼多吃”类型的合同诈骗案件。该案流转至刑事侦查中心办理。侦查民警先后赶赴内蒙古、海南等地调查取证，锁定了合同诈骗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依法对嫌疑人刑事拘留。

这是南京公安深化市局、分局、派出所三级实体受立案机制改革的一个缩影。今年前8个月，南京全市各级案件受理中心（室）前端接受理群众上门报案，其他机关移送案件1万余件，通过内部分流机制流转处理后，受立行政、刑事案件9400余件，转案率达93.3%。与此同时，全市刑事不立案案复查复核数同比下降19%，群众反映有案不接不受的信访举报投诉量同比下降30.6%。

改受立案流程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来到江北新区分局了解到，按照南京市公安局改革要求，该局在原有案件受理中心实体化运行基础上，创新升级了“法制牵头、警种进驻、现场审查”为主体，分局和派出所两级案件受理联动运行机制，将群众上门报案与执法司法机关移送的犯罪线索一并纳入流程监管，有效畅通了源头接报案机制。

“我们分局案件受理中心每天3人值班，确保有来自法制、刑侦或经侦部门的两名资深民警接待，另安排专人负责将信息数据录入平台，案件受理中心整个区域全部安装摄像头，拾音器并与监督平台联网对接，实行报案现场24小时同步录音录像，全程监管。”该局法制大队队长周银坤介绍。

周银坤说，分局从接处警环节破题，情指中心对110接报的违法犯罪类警情实行“双派警”模式，即同时向专业警种和派出所、警务站派发，通过专业警种提前介入发挥手段、资源优势，从源头上解决派出所、警务站在接处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线索遗漏、执法不规范等问题。

为强化“派出所主防”的改革定位，该局将原来派出所侦查职能剥离，对派出所刑事职责区大队进行职能再造，统一设置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按照职能划分为刑事案件线索侦办、治安行政案件办理和执法监督监督三

“改革紧盯影响如实受立案的核心障碍，明确应受尽受职责，群众可以到任意一个案件受理中心（室）进行报案。”南京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江北新区党工委委员、江北新区分局局长曹存福说，改革明确了全市各级案件受理中心（室）接报的模拟证券、期货市场等18类经侦支队直管案件，直接向经侦支队案件受理分中心转交的工作机制，以及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案件，直接向各分局经侦大队分流的工作机制，实现专业类案件由专业部门一口管理。

“专业化受立案、专业化侦查、专业化办案，大大提升了办案质量，仅从江北分局的改革情况看，原来案件从刑拘到移送审查起诉平均需要四五个月，现在已经缩短到2个月，其中刑事案件快办率大幅提升，尤其是作为衡量案件质量之一的检察监督数据，今年以来下降了27.4%，整个办案流程的质效得到了根本性转变。”曹存福说。

为防止有案不受理问题，南京市公安局专门开发了“受立案自接警模块”，对各级案件受理中心前端接报案登记受理，案件线索平台流转，办案单位后端调查处理，进行流程化管理。每一起接报案都通过“红黄绿”三色预警进行受立案审查期限风险管理，确保案件全程专业化监管。

案件受立案受尽受

“刑民交叉”问题长期困扰着司法机关，也是当事人最为关注的焦点、难点问题。如何通过改革破局？

2023年4月，江北新区分局案件受理中心接到南京栖霞区人民法院移送的一起案件，案件原系一起合同纠纷，但法院审理中发现被告公司经营涉嫌经济犯罪。

接到移送案件后，中心立即组织法制大队刑事案件审核人员对相关文书材料进行审核，“表面上销售商品，实际上以发展人员、击鼓传花的方式从事非法传销诈骗活动。”受理中心办案民警董飞回忆说，经过初步审查并将案件信息录入模块，该案经审批流转至经侦大队侦查中心办理。

“这家公司在公众号平台搭建了一个做翡翠拍卖的商城，并在小红书、抖音、百度贴吧等平台发布推广信息，或通过熟人私方式宣传售卖，公司承诺客户购买后次日翡翠价格就会上涨，不断诱导客户抢购，价值几百块钱的翡翠经过多轮拍卖可以涨到几万元。”该案主办民警毕翔龙说，公司仅仅经营了6个多月就崩盘跑路了，参与抢拍的几十人在高位被套牢，受害人一到法院起诉。

“该案犯罪行为模式新颖，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存在争议，案件流转至经侦大队后，了解到当事人曾到派出所报案过，但派出所所以民事纠纷为由未受理，只好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江北新区分局副局长李涛介绍，8月10日，经侦大队联合派出所出动40余名警力分别在南京、天津、安徽开展集中收网，抓获周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其中6人被刑事拘留。

“我们规定，法院、行政执法机关等移送来的案件线索，除了必须全部录入平台进行分析研判、监测监督，还要求法制大队全程跟踪办案进展。”李涛说，对案件必须在法定时限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对确实依法不够立案条件的，必须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

南京市公安局还推进各级案件受理中心与执法监督中心日常工作有效衔接、融合运行，将110线上报案和各级案件受理中心工作量纳入日常监管，特别是对经济案件、网络诈骗等疑难复杂案件接报案情况纳入重点监测。前几天，群众李某到玄武分局案件受理

中心报案，该中心发现其因信用卡被盗刷一事曾先到派出所报案，因首接地、盗刷地、开户行所在地不一致，相关派出所由谁管辖存在认识不一致，分局案件受理中心立即开展核查，确认问题后立即推进整改，将群众报案诉求及时纳入规范处置的流程。

自改革以来，南京公安有效解决了“平台主办与实际主办不一致”的执法症结，明确案件主办负责人4.9万人次，固定案件审批审核责任人2.9万余人次，每个执法活动都能在平台中找到对应审批审核人员，每起重大疑难案件，执法事项均有通案记录可循；问题多发案件实现“有人盯、有人管”，有效弥补了监督管理漏洞，刑事案件满意率达99.8%。

强化执法监督

南京市公安局打出了警务机制改革“组合拳”，通过强化涉网警情舆情处置机制，树立“把网情当警情”意识，通过规范“网上110”处置机制，对民意诉求制定了“精准交办、及时回应、分类整改”工作流程，大力加强全体干警执法为民理念教育和执法规范素质能力。

“改革推进到这一关键阶段，市局专业警种可能会发现，原先破案责任基本都下到了分局一级，现在却要直接承担指标，直接要去破案，最终发现‘改革最后改到自己头上了’。”南京市副市长、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常和平分析说，市局各大警种直接主战，就要打破行政管理模式，重塑指挥体系、力量体系，同时持续深化法治公安建设，加强执法源头、执法质量管理，建立全链条、闭环式、可追溯的监督管理体系。

常和平介绍，南京还率先在全国公安机关实施法制部门垂直改革，通过打破属地化机构隶属体系，南京6个城区分局和4个专业分局法制大队划归市局法制支队垂直管理，对全市刑事案件统一标准、统一尺度、统一指导、统一审核、统一出口，法制部门与检察机关口径对接。同时，江北新区、江宁、高淳等新区分局实行法制员派驻制，由分局法制大队统一派驻各基层所队站，以往同级监督、监督缺位等难题得以根本解决。

“为有效破除对执法活动的‘地域干扰’，市局明确法制支队派驻各分局法制大队代表市局监督管理分局各项执法活动，赋予派驻大队对派驻分局执法质量考评职责和权力制定5类58项职责清单，有效提升监督管理精细化水平，全面建成并实体化运行三级执法监督中心和三级受案中心，实行信息化模块化监管，对全部刑事案件全量审核，全流程监督。”常和平说。

改革后，全市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发现问题数逐年上升，被省厅专项执法检查确定问题数逐年减少，检察机关绝对不捕不诉案件数从2020年74件降至2022年7件，降幅达90.5%，实现了办案质量、效率双提升。

漫画/高岳

